

# 哈薩克獨立後政經情勢的變化與展望

侍建宇

## 一、前言

蘇聯解體後，哈薩克共和國獨立，自此脫離了近一百五十年沙俄與蘇聯政權的統治。

在沙俄時期，由於哈薩克人接受外來文化能力強，初時與俄人相處極為融洽。可是後來沙俄推動農奴解放政策，從一八九一年開始，烏克蘭與俄羅斯農民大量移入。估計一九一四年時，已有超過百萬的農民，占據哈薩克北部與東部較肥沃的平原，而哈薩克人被迫只好移往貧瘠的西南部。並且因為土地爭奪問題，終於在一九一六年引爆流血衝突。<sup>①</sup>自此埋下現今哈薩克北疆究竟誰屬的紛爭。

蘇聯政權統治篤信回教的哈薩克人，基本上是延續沙俄後期發展出來的種族滅絕（genocide）政策；<sup>②</sup>再加上所謂「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衍生出蘇聯化與俄化（Sovitization and Russification）政策。然而此兩種政策效果卻適得其反；種族滅絕與俄化政策非但未使哈薩克人「消失」，反而經由俄人有計畫的移入，文化差異加速種族間的摩擦，再加上隨俄人而來的西方民族主義觀念，於是乘勢塑造出真正的「哈薩克民族」。<sup>③</sup>

註① 哈薩克境內的民族問題，可從此次流血衝突作為開端。之後從一九二〇年代始，蘇聯政權大量有計畫屠殺遊牧民族的牲畜，導致約五十萬哈薩克人因此餓死

。一九五〇年代，又有大批俄人移入哈薩克，此舉造成俄人取代哈薩克人，在當時變為哈薩克第一大民族。自此為哈薩克與俄羅斯間的民族問題埋下了伏筆

。參見 Alexandre Bennigsen and Marie Broxup, *The Islam Threat to the Soviet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p. 20~22.

註② 「種族滅絕」政策，依其實踐方式，大致可分三類：大屠殺、強迫遷移、與文化斷絕。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具有回教傳統的民族，文化斷絕方式，乃是透過貶抑宗教本身價值，再切斷其它世界回教國家對其可能影響的管道，進而達到該種族不再認同回教的目的。

註③ Richard Pipes, *Russia Observ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219~221.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哈薩克共和國在納札爾巴耶夫總統（Nursultan Nazarbaev）<sup>④</sup>領導下宣布獨立。無可避免地，繼承了前蘇聯統治七十年遺留下的爛攤子。一方面需要建立前所未有的、毫無施政經驗的憲政體制；一方面還要重建發展失去俄援的哈薩克經濟結構。而擺在眼前俄哈之間的民族糾紛，再摻雜回教激進勢力伺機而動的介入，究竟納札爾巴耶夫總統要採取何種對策？中東回教國家本著種族相近、信仰相同的背景，均積極欲在中亞擴張勢力以增加在世界舞臺角色的份量。因此，境內外的回教運動對哈薩克社經情勢到底有多大影響力？影響的方式又為何？凡此種種，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 二、哈薩克獨立後的政經情勢

哈薩克的經濟在前蘇聯一直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別是在農業與礦產方面。然而由於前蘇聯採行中央計畫經濟制度，且同時將各加盟共和國依其原有經濟基礎來分工發展。在這種情況之下，哈薩克始終扮演經濟結構較下層的分工角色。所以，哈薩克獨立時，一則發現自己沒有制定與推動經改政策的能力；一則又陷於俄援停止缺乏資金，只有農礦業，卻無重工業作為加速工業化的窘境。

在哈薩克共和國獨立後，只好向外國與俄羅斯的經濟專家求援，以助其發展經濟。在一九九一年，就幾乎與俄羅斯同步實施「五百日經改方案」的震撼式療法（Shock Therapy）。透過急速私有化的一連串措施，在短期內將舊有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結構。其中哈薩克政府積極推動立法，將公有企業大量私有化，<sup>⑤</sup>並利用計點制（coupon system）以鼓勵人民消費、購屋置產。<sup>⑥</sup>然而始料未及地，這種速成的經改政策，在哈薩克與俄羅斯結果都一樣，均造成惡性金融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

因此，哈薩克政府決定延緩經改進程。從一九九三到一九九五為期兩年的時間，另行推動「抗危機方案」（anti-crisis

註④ 努什坦·納札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原為礦冶工程師，標準技術官僚出身，一九八九年崛起成為哈薩克領導人。在前蘇聯統治時期，施政即強調哈薩克國家利益至上。然而對於容易引發動亂的民族主義運動，則抱持絕不縱容的態度。參見 *EIU Country Profile 1992~1993: Kazakhstan*, p. 56.

註⑤ 根據 IMF, *Economic Review: Kazakhstan 1992* 報導，一九九一年底計有三百八十家大企業完成私有化。另外在一九九二年底，估計會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國營工業、百分之四十的農業、百分之一的住宅完成私有過程。然而實際的成果並不如預期理想。

註⑥ 哈薩克經改政策中的計點制（coupon system），乃是依居住當地時間長短、需撫養未成年小孩的數目、與本人工作年資，來決定開店購屋置產時，每人能享受的優惠程度。參見 *EIU Country Profile 1992~1993*, op. cit., pp. 58~59.

programme)。目的在降低通貨膨脹率。在私有化政策上，將以國家資本主義取代原先自由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⑦雖然推行新修正的經改政策仍是困難重重（譬如，脫離盧布貨幣圈等連帶牽扯的複雜問題）。⑧然而，就建立屬於適合自己的經改方向，嘗試擺脫俄羅斯陰影控制的角度來論，哈薩克的確跨出了第一步。不再像初獨立時，亦步亦趨、無所適從地隨著俄羅斯起舞。

除去經濟發展困難遲滯的問題以外，其它可能造成哈薩克政治局勢不穩的因素，就首推民族問題最為棘手。基本上自獨立開始，納札爾巴耶夫總統施政的主要重心就不曾須與稍離此主題。無論是制憲、還是跟激進反對勢力的周旋、甚至在與俄羅斯或回教國家交往的問題上，民族問題即是考慮的核心。

納札爾巴耶夫總統以為，要維持政治安定，就絕對不可縱容哈薩克民族主義運動。在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通過納氏主導的哈薩克新憲法，其中最具爭議就是確立國語（state language）的問題。經過幾番折衝，最後決定以哈薩克語為國語，而俄語亦為官方認可、社會通用的語言。這個決定充份顯示納氏務實的態度，體認俄人在哈薩克仍占多數的事實，儘量避免民族間摩擦衝突的機會。⑨當然透過新憲法的制定，納氏的威權統治地位也可取得合法正當性，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憲法中明定哈薩克總統必須是哈薩克人，且須精通哈薩克語。在這種情況下，納氏於是提名任命一俄人為總理，一哈薩克人為副總統。明顯透露納氏對民族情感的積極安撫與疏通，經由政治妥協以尋求各民族人民支持的目的。此外，新憲法賦予總統有提名任命總理、各部首長、與派遣駐外使節等權力。但是對彈劾總統與解散國會，行政與立法互相制衡的原則卻沒有說明。

註⑦ 此處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依據計畫乃是先將舊有國營企業分為大、中、小三類。「小型企業」的規模限制，最少擁有不動產五百萬盧布與兩百個員工

；「中型企業」則為一億盧布不動產與五千個員工以下；「大型企業」規模則不動產超過一億盧布，員工逾五千人。在一九九三年，由哈薩克政府將其部份產權轉賣予員工或私營企業。可是大部份產權仍由政府掌控。最後將所有企業合併，籌組成二十個大企業集團，以利經濟發展。而國家資本主義改革的構想可能是參考學自新加坡、韓國、甚至中國大陸等亞洲國家的改革經驗，參見 *ETU Country Report 1st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p. 36-38.

註⑧ 哈薩克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新貨幣「坦吉」（Tenge），正式脫離盧布貨幣圈的運作。坦吉對蘇聯舊盧布的官定比值是 Tenge 1: Rb 500。關於哈薩克脫離盧布貨幣圈的困境與爭議，參見 *Ibid.*, 1st quarter 1993, p. 36-39, 2nd quarter 1993, p. 52, 3rd quarter 1993, pp. 44-45, 與 4th quarter 1993, pp. 36, 37, 40, 42-43 (*Komsomolskaya Pravda*, Aug. 13, 1993, p. 1).

註⑨ 根據一九八九年的統計資料，哈薩克境內的俄羅斯人約有六百五十萬人，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八。在人口比例上，只比哈薩克人百分之三十九點七少兩個百分點（據傳在一九九三年哈薩克人已占百分之四十二）。再者，哈薩克境內會講哈薩克語的人僅占百分之四十，會講俄語的人卻有百分之八十三。因此在處理語言問題上，相較於它國的作法，例如波羅的海三小國訂立講俄語需受處罰的規定，可以明顯看出哈薩克的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在接納俄人與解決民族問題上的困境。如果禁講俄語，一定會加劇民族衝突的可能性。參見 *Ibid.*, 1st quarter 1993, pp. 34-35, 與 *ETU Country Profile 1992-1993*, op. cit., p. 57.

原因基本有二：其一是納札爾巴耶夫總統仍欲大權獨攬，名義上施行現代西方民主體制，實際上仍維持著傳統的獨裁政體；因此，其二便是將舊蘇聯獨裁的政治結構做形式上修正，原來的最高蘇維埃搖身一變成爲一院制的最高議會（the Supreme Kenges）。而此最高立法機關一年卻只集會兩次，會期如同往昔僅三日至一週，更明顯透露出它形式上的功能意義。一九九三年秋季的集會，哈薩克最高議會自行宣布解散，並決定於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全國進行重新投票改選。這樣繼續發展下去，如果納札爾巴耶夫總統不插手干涉的話，哈薩克最高議會中的政治生態，勢必將有一番新局。<sup>⑩</sup>在回教激進民族主義份子、俄人少數種族、與前共產黨員紛紛進入國會後，當然不願甘爲形式民主的花瓶，哈薩克最高議會的角色會有怎樣的變化，則值得等待更深入的觀察。

然而激進的民族主義份子對這新憲法卻十分不滿。哈薩克語言促進會（Qazaq tili）認爲語言是哈薩克民族的驕傲，俄語沒有資格且不能成爲法定的語言。此外居於哈薩克北部的哥薩克人（Cossack），對於新憲法並未將北哈薩克併入俄羅斯版圖亦表失望。<sup>⑪</sup>面對如此情勢，納札爾巴耶夫總統決定籌組哈薩克人民團結黨（People's Unity Party of Kazakhstan）。<sup>⑫</sup>首先可填補共產黨解散後，在朝政治勢力尚未整合的漏洞；其次也可透過政黨政治，有組織的力量去抗衡反對勢力的活動；再則也可藉由政黨這個管道，有計畫的宣揚納氏個人政治理念。雖然納氏治國的理念——「公民和平與民族同心」（civil peace and national accord），強調以文明和平的方法增進各個民族間的融合，共同爲哈薩克共和國的前途奮鬥努力。<sup>⑬</sup>表面上看來既抽象又並無突出之處，然而這已足夠再一次顯示出納氏對和平解決民族爭端、推動民主政治的企圖。

西方學者曾對前蘇聯領導人統治模式作過研究，其中「成熟的史達林主義體制」（mature Stalinism）可說是維持前蘇聯政經穩定發展的基本型。此體制的特色即是：運用恐怖統治以穩定政治秩序，與成功地動員社會資源以促進經濟成長。之後的布里茲涅夫時期，對於此基本型因應實際需要做了一些修正。其中把恐怖統治局限在統治精英以外的廣大群眾身

註⑩ See: (1) *Ibid.*, 4th quarter 1993, pp. 36~37. (2)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News Digest for Jan. 1993*, p. 39271.

註⑪ 其它較溫和的團體，譬如「哈薩克作家與科學家協會」（Kazakh Writers and Scientists Society），以及西哈薩克居於 Ust-Kamenogorsk 城的俄人，均對哈薩克新憲法中有關語言問題的規定感到滿意。

註⑫ 「哈薩克人民團結黨」（People's Unity Party of Kazakhstan）正式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六日，在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Alma Ata）成立。納札爾巴耶夫總統被推選爲黨魁。納氏前主要諮詢幕僚 Serik Abdrakhmanov 被任命爲黨政治局主席。參見（1）*Keesing's Record*, op. cit., for Feb. 1993, p. 38319. (2) *The Current Digest*, Vol. XLIV, No. 41, 1993, p. 30.

註⑬ 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公民和平與民族同心」（civil peace and national accord）的主張，乃是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一日，「爲社會進步和諧而團結」（Consolidation in the name of social progress and partnership）爲題的演說中，所提出的見解。參見 *EIU Country Report*, op. cit., 2nd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 47.



上，然後再減緩動員速度以改善民生，好讓百姓逐漸「習慣」如此的寡頭統治。<sup>④</sup>而上述的這種統治模式，也或多或少為獨立後的哈薩克所繼承。譬如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對媒體的管制，其實也就是恐怖統治表現的一種延伸。<sup>⑤</sup>但是納氏所處的情勢更為複雜。他所面對的，不似布里茲涅夫時期的「封閉型社會」，而是戈巴契夫「開放、重建」過的社會。從處理經濟困境、民族問題、與創制新憲法的行動中不難發現，納氏已不可能完全透過史達林或布里茲涅夫主義體制來尋求統治的合法正當性。那麼，在共黨獨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機器毀損後，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將依循何種途徑建設「新哈薩克」？是尾隨俄羅斯「老大哥」拼命激進經改呢？還是擁抱阿拉真主加入回教國家之列？換言之，納氏在處理哈薩克內政問題之際，另一必須深思的層面，就是如何在民族、宗教、甚至經濟發展等相互糾結的問題之上，因應外來區域強權涉入，進而產生的互動影響。

### 三、哈薩克、俄羅斯、與中亞國家關係的發展現況

後蘇聯時代，哈薩克在發展對外關係的課題上，尤其重視與俄羅斯或中亞回教國家的交往。除去摻雜經濟利益的考量之外，哈薩克與這些國家交往過程中，仍須注意民族主義興起與回教激進勢力結合的後果。這種種不僅攸關哈薩克當今政經改革是否能夠成功的關鍵，甚至還可能立即威脅到哈薩克國家存亡的安全。面對如此情況，納札爾巴耶夫總統的外交政策制定方向，必然會對哈薩克未來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

自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變」後，俄羅斯葉爾欽總統隨即邀集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同年十二月八日於明斯克（Minsk）共組「獨立國協」（CIS），可是卻未邀請中亞回教國家與會，令他們十分不諒解。因此一九九二年五月，中亞回教國家加上伊朗與土耳其，在阿什克巴（Ashkhabad）抱著對抗的心態，先行於獨立國協開會前集會，有意共組類似「政治經濟共同體」的組織。但是因為其中較富國——土庫曼（Turkmenistan）拒簽成立中亞單一投資基金與銀行的協定，<sup>⑥</sup>不願資助弱國才功敗垂成。中亞經濟統合未竟全功，敵視俄羅斯自然也就沒有必要。況且與俄國改善關係，哈薩克一方面可以順勢疏解國內

註④ 參見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9~27, 47~61.

註⑤ *EU Country Report*, op. cit., 2nd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 48~49. 與 3rd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 44.

註⑥ 中亞較富的國家一般以為是哈薩克、土庫曼、與烏茲別克，塔吉克與吉爾吉斯為較貧國。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亞五國加上土耳其與伊朗在土庫曼首都阿什克巴（Ashkhabad）集會，會中土庫曼拒簽中亞成立單一投資基金與銀行的協定。理由是中亞各國經濟情況並不佳，如果再劃地自限成立「共同體」，只會阻礙外國資金流入的意願。再者，較貧國不應該奢望較富國無限的濟助。透過雙邊協定，彼此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才是發展正途。土庫曼此舉，使中亞統合區域經濟的第一步行動即受挫。參見 Boris Z. Runer, "The Gathering Storm in Central Asia", *Orbis*, Vol. 37, No. 1 (1993), pp. 92~93, 98~100.

俄人不安的情緒，更可利用俄國強大的軍力，共同防範回教激進勢力與中共趁亂挑起邊界糾紛。<sup>⑮</sup>然而為保持哈薩克與俄羅斯主權平等的地位，避免因為駐軍而成為俄國附庸的嫌疑，哈薩克決定積極參與獨立國協的運作。無論在盧布貨幣圈、成立國協聯軍、或開設國協法庭等議題上，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均是當先的極力鼓吹。<sup>⑯</sup>在經濟合作方面，一九九三年下半葉，哈薩克同意北方俄羅斯人占多數的九省，與俄國南邊西伯利亞的十一省共組俄哈邊界跨省協會（Interstate Association of Contiguous Territories of Russia and Kazakhstan）。而此協會成立的基本目的就是欲透過一關稅聯盟性質的組織，重建兩國邊界貿易的管道。然而，此舉在將來是否會演變成哈薩克北境俄人重提併入俄羅斯之議，引發民族糾紛，則有待觀察。<sup>⑰</sup>

當然在與俄國修好的同時，地處中亞的哈薩克也從未忘記與鄰國增強合作關係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九〇年，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即聯合烏茲別克的卡里莫夫總統（Islam Karimov）籌組一個鬆散的區域委員會。該會每年集會乙次，目的是為增進中亞各國領袖互相瞭解，避免爭端的發生。其間，亞塞拜疆（Azerbaijan）更建議創設包括伊朗與土耳其的裡海區域合作組織。<sup>⑱</sup>前蘇聯瓦解之後，中亞經濟統合並不算理想。雖然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哈薩克即正式加入回教經濟合作組織（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活動，從伊朗、土耳其、與巴基斯坦等回教國家，獲取修建鐵路與數億美金等貸款援助的承諾。<sup>⑲</sup>且一九九三年一月在塔什干（Tashkent）中亞國家高峰會議上，哈薩克宣布加入中亞國家集團，以象徵中亞國家日益團結緊密的關係。<sup>⑳</sup>然而，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在此時仍每不忘宣示，哈薩克與中亞或回教國家彼此增進關係，目

註⑮ 中國新疆省與哈薩克共和國交界處，在前蘇聯時期，即因邊界問題而糾紛不斷。且中共並不承認一八八一年聖彼得堡條約所規定的疆界。因此哈薩克希望與俄國共組邊界部隊，以保安全。參見 *ETU Country Report, op. cit.*, 1st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 36. 此外，哈薩克與俄羅斯於一九九二年八月始，連續同意簽訂雙邊軍事合作訓練、開採鉍礦、與共同軍事防衛區等協定。參見 *ETU Country Report, op. cit.*, 2nd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 49. 與 *Keesing's Record, op. cit.*, for Aug. 1992 and for Mar. 1993, p. 39054, 39368.

註⑯ *Ibid.*, 2nd quarter 1993, p. 49.

註⑰ *Ibid.*, 3rd quarter 1993, p. 43~44.

註⑱ Martha Brill Olcott, "Central Asia's Post-Empire Politics", *Orbis*, Vol. 36, No. 2 (1992), p. 265.

註⑲ 哈薩克參與回教經濟合作組織的活動情形，參見李玉珍，「前蘇聯中亞各共和國的發展走向」，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九期，第七三頁。與 *ETU Country Report, 4th quarter 1992: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pp. 77.

註⑳ 前蘇聯統治時期，哈薩克並不屬於名為 *Srednaya Azia* 的中亞行政區，而自成一區。其與莫斯科的關係，往往比與中亞四國的關係密切。參見 *Ibid.*, 1st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p. 35~36.

的「主要集中在經濟合作的議題上，絕沒有任何宗教理由」或對抗俄國的意圖摻雜於其間。<sup>⑳</sup>

從納札爾巴耶夫總統的種種表現來看，哈薩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其實是有兩條主線；一條是以俄羅斯為主軸，其中再含有俄哈民族糾紛、經濟紐帶未斷、與國家邊界安全等三個變數。另一條則是與中亞或其它國家的交往關係，內容不外是爲了尋求外資與促進經濟合作而已。可是，這兩條發展路線卻存在著矛盾衝突之處，原因出在俄羅斯與回教世界國家的互不信任。在一九九三年六月與七月，俄羅斯在分別與烏克蘭、白俄羅斯簽訂成立斯拉夫經濟聯盟（Slav Economic Union）之後，卻不同意哈薩克申請加入的要求。根據俄國副總理索金（Aleksandr Shokhin）當時表示，俄國之所以不讓哈薩克加入，原因是哈國爲回教經濟合作組織的會員之故。雖然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再三聲稱，兩者之間利益並不衝突，甚至納氏還建議俄國可申請加入回教經濟合作組織（當然伊朗、土耳其、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也不會輕易讓俄國入會），俄國還是不予理會。<sup>㉑</sup>俄羅斯與回教國家之間爲何互有偏見並非本文探討的重點。然而，從回教教義實踐的過程中，所展現那種封建的、武士戰鬥的、與政治結合的精神與要求，<sup>㉒</sup>卻使人不得不認真評估回教在擁有眾多回教徒的國家中所產生的影響；而哈薩克剛好就是符合這樣條件的一個國家。

#### 四、當前哈薩克潛伏不安的因素——回教

哈薩克民族自古即虔信回教（信徒多屬遜尼教派（Sunni）<sup>㉓</sup>），有著很深的回教傳統。因此，在前蘇聯統治時期，回教對於哈薩克人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更是一種有別於「蘇聯人」的民族與文化象徵。<sup>㉔</sup>這樣的背景使得蘇聯各個領導人，

註⑳ *Nezavisimata Gazeta*, May 29, 1992, quoted by Rumer, op. cit., p. 102.

註㉑ *ETU Country Report*, op. cit., 3rd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p. 44~45.

註㉒ 韋伯（Max Weber）對回教的看法可參見，（一）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社會學*，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初版，第三二七~三三二頁。

註㉓ Patrick Bannerman, *Islam in Perspective: A Guide to Islamic Society, Politics and Law* (London: Routledge, 1985), pp. 7~30. ㉔ Bryan S. Turner, *Weber and Isla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pp. 7~21.

註㉔ 回教在哈薩克民族形成之前即已傳入中亞，參見（一）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初版，第三四一~三五九頁，三七二~三七六頁。（二）Martha Brill Olcott, *The Kazakh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pp. 18~23.

註㉕ See: (1) Edward Allworth,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62~572. (2) Sabrina Rame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George Moyser (e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90~92.

無不視回教信仰為統治哈薩克的主要障礙。在史達林統治初期，經由摧毀傳統回教習俗與改變教育體制兩方面來消滅回教的影響力；譬如關閉回教法庭與寺廟，以及開辦新式學校，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等手段。欲換取哈薩克人對共產政權的認同，達到徹底摧毀回教的目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迫使史達林必須拉攏少數民族一致對外，因此對回教的管制稍有放鬆，出現官方支持的回教組織，即是中亞與哈薩克宗教行政委員會(SADUM)。<sup>29</sup>一直到蘇聯解體前，這個組織除去一般的宗教活動外，不僅對外充當前蘇聯與中東等其它回教國家交往的橋樑，對內則負責化解融合馬列主義與回教教義之間的衝突。<sup>29</sup>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由於前蘇聯入侵阿富汗與伊朗回教革命的影響，哈薩克的回教徒開始出現不穩現象。在一九八〇與一九八六年，於首都阿拉木圖發生兩次大暴動。首先是因為戰死阿富汗的回教士兵不能葬於紅軍公墓，引起哈薩克回教徒的不滿。接著由於戈巴契夫任命俄人擔任哈薩克共黨第一書記，致使哈人產生被歧視之感而發生暴亂。至此前蘇聯中央才發現到哈薩克動亂的癥結所在。表面上是因為經濟情況不佳所導致的民怨，而真正潛伏的不安因素，乃是回教激進勢力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之後，納札爾巴耶夫接掌哈薩克共產黨，在經濟、宗教、與文化復興方面推動了多項改革。他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建立哈薩克自己的宗教行政委員會，並同意回教長老集合境內僧侶予以統一訓練，藉此換取回教勢力的支持。<sup>30</sup>然而，納氏仍無法動搖傳統回教組織的影響力，那就是哈薩克南部省分為非官方組織支持的回教蘇菲派(Sufi)所控制。此派宗教中心位於哈薩克南部城市土基斯坦(Turkestan)，最早在哈薩克活動的記錄可上推至西元十二世紀，且早在前蘇聯時期就一直被定位成仇外的民族狂熱團體。<sup>31</sup>

蘇聯瓦解後，回教國家如伊朗、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無論是透過宗教宣傳或經濟援助計畫，均積極介入中亞事務以擴張政治勢力。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對於這些國家的經濟支援當然樂觀其成；但是對於伊朗在背後鼓動的基本教義派活動，

註<sup>29</sup> 史達林初期在哈薩克「消滅回教」的政策，都市實行的成效比鄉村好很多。其中原因可能是回教已經與農村生產結構密合，而史達林並未能打破此種社會結構。參見 Olcott, *The Kazakhs*, op. cit., pp. 194~198.

註<sup>30</sup> See: (1) Yacov Roti, "The Islamic Influence on Nationalism in Soviet Central Asia",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 1990, pp. 50~51. (2) Azade Ayse Rorlich, *Islam and Atheism: Dynamic Tension in Soviet Central Asia*, in William Fierman (ed.), *Soviet Central A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200~201.

註<sup>31</sup> Martha Brill Olcott, "Perestroika in Kazakhstan",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 1990, pp. 65~72.

註<sup>32</sup> See: Marie Broxup, "Soviet Perception of Militant Islam", in Hafeez Malik(ed.),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outh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 75~76. 回教蘇菲派在沙俄與蘇聯時期活動的歷史，可參見 A. Bennigsen and S. E. Wimbush, *Mystics and Commissars*.

卻十分不以爲然。早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塔吉克(Tajikistan)境內屬於回教遜尼基本教義運動的瓦哈比派(Wahabism)，就曾在伊朗回教激進份子的煽動之下，譴責阿富汗戰爭是侵略行爲，開始鼓吹反蘇聯，並提出廢除官方宗教組織以回歸正統教義治國等要求。塔吉克共和國獨立後，瓦哈比派更串聯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族裔，擬建立更大的塔吉克國。這樣一來，約占塔吉克境內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四的烏茲別克人，與烏茲別克境內約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塔吉克人，遂成爲兩國處理民族問題的燙手山芋。<sup>32</sup>由於塔吉克人在哈薩克是少數，「大塔吉克主義」或對哈薩克並不會有直接的影響。然而這種回教政治化與反對勢力結合的模式，再加上民族主義的情愫於其中，就很難斷定不會爲哈薩克在野反對派所仿效。

納札爾巴耶夫總統繼承共黨極權統治的模式，並爲防止哈薩克在野勢力擴大發展阻礙他的改革步伐。哈薩克初獨立時，一方面扶持羽翼政黨人民議會黨(People's Congress of Kazakhstan)；另一方面極力打擊反對黨派。只要納氏認爲某在野黨具有偏激的傾向，便不准其登記成爲合法政黨，其中哈薩克共產黨就屬最佳的例證。後來，納氏更經由內政部檢查各政黨財政資金的來源與流通記錄，做爲打擊反對黨派的佐證工具。其中一個名叫Nevada-Semipalatinsk Anti-Nuclear Movement 推行反核運動的政黨，就是因爲政府聲稱其非法涉入商業活動而名聲大損。至於強調民族主義的哈薩克民族自由黨(Azat)，或以宗教爲號召的回教政黨(Alash)，則根本不可能以公開形式活動。所以這些激進政黨也把納札爾巴耶夫總統視爲首號敵人，利用其親俄羅斯的形象冠以「哈奸」的頭銜，以期能夠打擊他的聲望。<sup>33</sup>

當然納札爾巴耶夫總統也深知高壓強制的手段並非長久治國之計。因此，就目前情勢看來，欲防止回教與民族主義連成一氣造成政局不穩，就只有斷絕中亞回教基本教義運動的源頭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因此，納氏宣稱哈薩克將支持塔吉克內戰中杜桑比政權(the Dushanbe government)，以對抗南方發動內戰的基本教義激進份子。再者，雖然俄羅斯表示無意涉入中亞國家間的回教事務與糾紛，哈薩克仍然不斷鼓吹獨立國協參與停戰協商，並組織和平部隊前往塔吉克維持秩序。<sup>34</sup>換言之，由於俄羅斯軍力最強大，且仍有軍隊留駐中亞各國境內，納氏便欲俄國擔任起獨協警察的角色，以便抵抗回教反對勢力的繼續坐大。<sup>35</sup>

註<sup>32</sup> See: (1) Rumer, *op. cit.*, pp. 94~96. (2) Broxup, *Militant Islam*, pp. 77~79.

註<sup>33</sup> See: (1) *EIU Country Report, op. cit.*, 2nd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 48, 4th quarter 1993: Kazakhstan, p. 36. (2) Olcott, "Central Asia's Post Empire Politics", *op. cit.*, p. 264.

註<sup>34</sup> 塔吉克共和國因爲內戰與送經政爭之故，至今仍不確定由何人主政，故以首都「杜桑比」爲名稱呼其政權。另參見 *EIU Country Report, op. cit.*, 3rd quarter 1993, p. 43.

註<sup>35</sup>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獨立國協於土庫曼首都阿什克巴集會前，俄羅斯與獨協會員國簽訂一連串的軍事技術雙邊協議，強化了俄國作爲獨協警察的角色。參見 Rumer, *op. cit.*, pp. 101~102. 與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十版。

## 五、結語

哈薩克的民族問題可說是納札爾巴耶夫總統施政考量的終極核心，而回教基本教義激進份子卻是促使民族問題惡質化的首要因素。納氏處理民族問題基本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制度面；一是外交面。經由新憲法的制定，在制度面，確認並鞏固了納氏總統角色的合法正當性，以及初步解決境內俄羅斯與哈薩克民族由語言問題造成的爭端。在外交面，哈薩克與俄羅斯拓展彼此關係的發展上，俄語被憲法認定成爲哈薩克國內通行的語言，也可避免俄羅斯民族主義份子以哈薩克境內俄人問題大作文章，帶給葉爾欽總統額外的困擾。這樣一來在兩國和諧的關係下，俄國才有可能動用軍隊，來支持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對抗回教基本教義派的主張，疏解眼前回教極端份子與民族主義掛鉤的壓力。

同時，納氏鼓吹俄羅斯共組獨協和平維護部隊，意圖以同爲獨立國協成員爲理由介入塔吉克內戰。藉此打擊以「大塔吉克國」民族主義爲號召的回教基本教義派勢力，減弱哈薩克境內欲東施效顰的回教激進份子。

雖然看起來，在大致掌握民族主義與回教激進派這兩個不安的變數後，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在哈薩克推動的經濟改革政策似乎有了成功的希望。然而，實際上問題並未解決。哈薩克是一個長期浸淫於回教文化中的民族，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裡，絕不可能忽略回教傳統對改革內容的反省，而一味用壓迫控制的手段來求取表面上的安定，如此將難以維持長治久安。

## 後記

哈薩克國會已經於今（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改選完畢。這次改選在國會結構的形式與組成上有變動。就結構形式而言，將原有「最高蘇維埃式」三六〇個席位的國會，裁減成新國會的一七七個席位。次就新國會的組成份子而言，由於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對選舉資格與方式的有意設計，<sup>98</sup>使得當選議員大多屬於納氏的支持者。根據西方評論家的看法，新國會終將淪爲總統的「大型諮詢團」，如此不僅削弱了各種反對勢力的聲音，更可增加納氏威權統治的權力。

註98 納札爾巴耶夫總統對新國會議員的選舉資格與產生方式，設下兩種不利反對勢力的限制：一則是新聞從業人員、獨立工聯的領導者、民族主義團體成員、與曾經公開抨擊納氏施政者均喪失資格登記成爲議員候選人，致使有一四六位反對勢力精英無法參加競選。再則是一七七個新國會的席位中，有四十二席是由總統自行提名六十五名候選人來競逐。換言之，只有一三五個國會席位是自由參選的，而將近有四分之一的席位是由「總統提名，人民同意」的形式所產生。如此，當選的國會議員自然多爲納氏的擁護者。參見〔1〕*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1994〔2〕*The Economist*, Vol. 330 No. 7854, p. 35.